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吕振羽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吕振羽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振羽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选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 5004 - 2972 - X

I . 吕 … II . 中 … III . ① 吕振羽 - 文集 ② 史学 - 文集  
IV . 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2834 号

责任编辑 李树均

责任校对 郭 娟

版式设计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贞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2

字 数 317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 编者的话

吕振羽先生（1900—1980），湖南邵阳人，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先生早年读中学时即参加了“五四”运动，1926年在湖南大学毕业后，立即投身北伐战争。1929年后，吕先生在北平创办《新东方》等杂志，从事中国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研究，积极投入反帝反蒋运动。在白色恐怖下，吕先生刻苦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组织进步团体，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并先后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民国大学等校任教，是当时著名的“红色教授”。“九·一八”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担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参与筹组热河抗日义勇军，保护进步学生，多次营救被捕同志。

1935年底至1937年，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部署，吕先生受中共北方局和刘少奇委派，驻南京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他不避艰险，坚持原则，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方针，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吕先生奉调湖南，组建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积极从

事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1939年，奉调重庆，在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理论战线、历史研究和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转往苏北解放区，任教于华中局党校，参加了反扫荡战斗。1942年，跟随刘少奇千里行军回延安，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和学习秘书，并任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特别研究员。

解放战争时期，吕先生在东北，曾任热西地委副书记、冀热辽救济分会副主任和辽宁省委常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吕先生先后任旅大区党委委员、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原大连大学）、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兼任教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1963年，吕振羽先生蒙受不白之冤，失去自由。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构陷刘少奇，广事株连，将1936年的国共南京谈判说成“勾结蒋介石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罪恶活动”，将吕先生投入监狱，进行残酷迫害。1975年1月，吕先生被释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长期迫害，吕先生身心遭受严重摧残，1980年7月17日凌晨不幸去世，终年80岁。

吕振羽先生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二者兼而为之，融于一体。在革命征途上，他以学术为武器，披荆斩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30年代初开始，他就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指导，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建国后如火如荼的热潮中，他一直笔耕不辍，给我们留下了数百万字

的著述。这些遗著反映了吕振羽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以及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学者，吕先生第一步便是弄清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亦即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探索。1932年至1934年，吕先生先后出版和发表了《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上）一书，《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和《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等论文，以及《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比较丰富的资料，论述了现代世界和中国从古至今的经济发展与曲折，社会矛盾状况与趋向，从而宣传了进步的革命思想。他的经济学说得到了当时学界的好评。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深入，吕先生把研究重点转向了中国社会史。从他写下的大量史学篇章中，读者依然可以看到这位大师在经济史研究上的功力。

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和古史分期问题上，他以地下出土物为骨骼，从远古神话传说中，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描述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群和母系、父系氏族公社的状况，破解了三皇五帝的历史神话，冲破了“东周以前无史”的禁区，为科学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和奠定了一块基石；他从殷商遗物和甲骨文字中，揭开了殷商社会的奥秘，首倡殷商为奴隶社会和青铜器时代，继郭沫若之后，把中国奴隶社会研究推进了一步；他对西周社会的研究，破除了旧观念上的封建陈说，从科学意义上分析了西周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诸形态，提出了西周是中国初期封建社会，即领主制封建社会的理论；他还提出，西周至春秋战国初期，封建制是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奴隶制的消失，领主制的扩张，地主制的出现，都经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交叉过程；秦统一中国后，

地主封建制才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封建社会才走进它的第二阶段；此后封建社会又经过了若干次小的调整和大的改革，至明末，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它的内部已开始孕育资本主义新因素，明清之际，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清统治者入关和鸦片战争，两次摧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幼芽。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剧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民族民主革命便应运而生，等等。这些观念和理论，已成为现代人们的一般常识，似乎已不足为奇。若我们要问起这些历史常识的来源，请不要忘记吕振羽先生。在30年代初期，这些观念和理论，正是吕振羽先生等人历史研究的新成果。这些成果不仅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论断的真理性，给中国革命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他和郭沫若等人一起，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开辟了新天地，奠定了新基础。

在哲学史、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先生也别开生面。他超越前人就思想论思想的窠臼，把思想研究放在社会发展形态、物质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不仅研究思想家思想本身，更注重研究这些思想的社会性，即思想的来源，思想的继承、发展和演化，思想的代表性，以及思想的社会影响等等。特别研究了这些思想的阶级性和它们在世界观上的归属。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三条线索和两大阵营。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勾画出了一幅清晰的脉络。他的这一划分，虽不一定恰如其分，但却为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理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为科学的中国思想通史奠定了一块基石。

在民族史方面，他在40年代就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写出了一本《中国民族简史》，其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的考证文章。在这些著述中，他用民族平等观念对待民族史，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分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地下发掘、书本材料和民俗调

查三结合的方法加以研究，得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进步、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论断。指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基本特点乃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和依存、互相渗透和推动的关系。而民族的分裂和战争，乃是各民族统治集团造成的，是历史的暂时现象。中国从秦汉以来之所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一不可分割的纽带。

此外，吕振羽先生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内部分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本文集因篇幅所限，仅收录了吕振羽先生数百篇文章中的一小部分。先生的专著未予收入。先生已出版的几种论文集，我们都收录了其中十数篇。这些文章当然不可能全面反映吕振羽先生治学的全貌，但也能从一些重要方面窥见一斑。值此吕振羽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以此作为纪念。

我们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之托，为吕先生编此文集，深感荣幸。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如人意处可能不少，敬请读者鉴谅。

刘茂林 叶桂生

2000年3月

#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殷代奴隶制度研究.....	(1)
周人国家创设的过程 .....	(35)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	(50)
论两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	
——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	
问题的探讨 .....	(85)
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	(112)
秦代经济研究.....	(134)
隋唐五代经济概论.....	(145)
关于明迄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	(180)
孔丘派哲学思想的发展	
——由孔丘到荀卿.....	(190)
老聃派哲学思想的发展	
——由老聃到庄周.....	(238)

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	(263)
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 过程.....	(283)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	(339)
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	(354)
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	(377)
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的争论.....	(392)
 作者著述目录.....	(411)
作者年表.....	(413)

# 殷代奴隶制度研究

## 一 关于殷代史料问题

### (一) 周易

“周易”的本身应分为不同时代的两个部分——卦爻辞和系辞。关于后者，相传为孔子所作，这是很难凭信的。左传：“晋韩宣子来聘，观书太史氏，见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是“易象”在春秋时已存在，或系可靠。易传究出自何时，我们现在颇难于判定；但从其构意去考察，似属一种变革时代的思想的反映。同时关于其以前的时代的历史，作者从动的观点统给它否定了。一叙述到其自身的时代的现实上，便又转入于一个静止的主观的肯定的观点。因而在周初似有产生这种作品的可能——我们虽然不敢遽然判定。

关于卦辞和爻辞产生的时代，历代儒家的各种传说，均难作凭信。因为儒家根本就戴了一副着色眼镜，不惜替卦辞和爻辞也披上一件神秘的袈裟。拿我们现在科学的眼光去研究，所谓卦辞和爻辞，不过是关于古代阶级社会的“人吃人”的简略记事，并不曾看出有何种神秘在。我们对其产生的时代作一判决，只有从

其本身去考察。因而：

1. 从卦辞和爻辞所说明的社会以及其文体看，无宁和甲骨文很相类似。不过按卦分类，编辑成书，这许是后人的勾当。

2. 文中所记的人物有“帝乙”“高宗”“箕子”，这无论“帝乙”系“成汤”或“纣父”，“高宗”系“武丁”或“武乙”，总之他们都属于殷代就够了，至于那种有闲阶级的“考古”勾当，我们无暇与之争论。

依此判定卦辞和爻辞为殷代史料，便不算牵强。

不过我们若以为据此便能把殷代的社会充分说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它究竟只是一种关于占卜上的简略记事，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历史的编述。其文辞不免概略，在三千年后的我们，便难于完全了解。所以它只能给我们暗示着殷代社会的一个影子。

## (二) 殷虚遗物

殷虚前后出土遗物之为殷代铁一般的史料，是毫无问题的。问题只在于它们是否能代表殷代文物的全部，再则关于甲骨文字的各家释文是否完全正确，这也是有问题的。

殷虚前后出土遗物及考释，大致能概见于如次的各书中：

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八卷，后编二卷，《铁云藏龟之余》一卷，《殷虚书契菁华》一卷，《殷虚古器物图录及附录》共二卷，《殷虚文字待问编》一卷，《殷虚书契考释》三卷，《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卷及《殷周文存》《吉石庵丛书》等。

王国维：《海宁王忠懿公全集》中关于殷代遗物的各种著作。

孙贻让：《契文举例》。

刘铁云：《铁云藏龟》。

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

商承祚：《殷虚文字汇编》十四卷。

王 襄：《簠室殷契徵文》（郭沫若认系伪片）。

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yies）：《殷虚卜辞》（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e of Yin）及《骨片上所雕一首葬歌及一家系图》（A Funeral Elegy and a Family Tree Inscribed on Bone）（郭亦认为全系伪片）。

林泰辅（日人）：《龟甲兽骨文字》。

（S. conling：Oracle-bones from Honan）（郭亦认为全系伪片）。

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已出至第四期）；《蔡元培六十五岁论文集》。

郭沫若：《甲骨文释》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

其他关于各种金文中所收集之可靠殷代遗物等。

### （三）商书各篇

史记称尚书中有商书二十余篇。存者共五篇<sup>①</sup>：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这五篇之中，汤誓一篇，其构意与所谓“夏书”之甘誓完全为同一公式，其文词亦不似其他各篇之诘赘难解，故其时代显系后于其他各篇，断难作为商代信史。

盘庚篇（共上中下三篇），国内学者从各方面考定，已一致确认为商代信史。兹不赘费。其他三篇，王国维等亦判定为商代信史。我们从其所说明的时代性以及其文词构造，大体亦殊能与盘庚篇相衔接；不过又似乎夹杂有后人润色的形迹在，这或者是事实。因而我们在引证上不可不加考辨。

<sup>①</sup> 按今本尚书注云，隶书写古文二十五篇，商书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又今本尚书共十七篇。

此外在周初的可靠文献中（周书）有关商代的史料，也有相当可靠的。其他古籍中关于商代的记事，究其量也只能作为历史的副料。

## 二 殷代的经济组织

就既有的殷代史料能说明的殷代经济性，是氏族社会的，还是阶级社会的？这不是让我们来诡辩，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在奴隶制和晚期氏族制这两者之间在社会下层基础从而其上层建筑的诸形态上都有其各异的特征，这是不容混淆的。

我们要想正确地认识一个时代的社会的本质，必须从其当时所反映的各种现象作辩证的考察。若是把每个现象从其当时社会存在的一联的象征中孤立起来去考察，便只能作出：

是——非

非——非

甲即是甲

乙即是乙

非甲即乙

的结论来。那只有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才是如此。他们对于问题的本质是无法接近的。因为孤立的各个现象，并不能说明其自身。不幸的是我们那班自号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史研究者（自然，那不过是一些冒牌的，半截的货色），却都在如实地履行着十足的实验主义的方法。

因而在氏族制晚期的农业和牧畜，和奴隶制下的农业和牧畜，在我们的实验主义者看来，“农业”就是“农业”，“牧畜”就是“牧畜”，难道还有什么质的不同吗？家长制时代的“奴隶”和其后来的奴隶制时代的“奴隶”，也就不能不是同一的“奴

隶”，并没有什么质的差异了。像这一类的说明，对问题有什么帮助呢？还不是真理遭殃吧？

其次，我们的历史家更从而可以作出以残余作为主要，以局部概括全部的结论出来。如我们的郭沫若先生，他看见商代王位有“兄终弟及”的事实，有“常常专为先妣特祭”的事情，尤其是所谓“多父多母”的形迹的存在，便忍不住的大声疾呼：“商代不明明还是母系中心的社会”，“那时候的家庭不明明还是一种‘彭那鲁亚家庭’吗？”“那以前的社会就不言可知了！”

此外的一班殷代氏族社会论者，都还比郭先生落伍得多，并且他们所引用的材料和理论，也多半零碎的袭自郭著——虽然他们又都拿出其英雄式的本领在非难郭君。所以我特别提出他来作代表。

此外在我们的“唯物论”历史家的血液中的实验主义的成分，便是他们不了解因历史的连续发展的中断而引起向前飞跃的形势，以及“突变”和历史的质的变化的联系，反之，他们却认为在“渐变”的连续过程中能完成历史的质的变革作用。因而在殷周之际的那一次历史的变革，却有人认为不曾引起质的变革；在西周和东周之际那一连续发展的进程中，反之有认作历史的一大变革期。

以下我们从殷代的经济组织来作一实际的考解。

### (一) 殷代的生产和生产关系

1. 牧畜——先说牧畜，就现有出土甲骨文字中，殷代的家畜，我们现代人豢养的家畜——牛、羊、鸡、犬、豕、马等，已应有尽有，例如：

辛巳卜丰贞埋三犬，煮五犬五彘，卯四牛，一月。（殷虚书契前编，卷六，3页）

系马乎取王弗每（新获卜辞，一五七）

庚子卜贞□羊，征于丁□用雨。（殷虚书契后编，12页）

鸡（甲骨文字汇编，卷四收集）

把家畜用作牺牲的数目，据郭沫若的举例，每次有多至“三百”“四百”者。这诚如郭先生所说，“不是畜牧最盛的时代是决难办到的”。畜牧业的繁盛，用家畜牛马参加劳动或作为交通工具使用也可看出来。例如：

贞擎牛五十。（殷虚书契前编，卷一，29页）

贞鬯御牛三百。（同上，卷四，8页）

癸未，王□贞，有马在行，其在射获。（殷商贞卜文字考）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易，贲六四）

屯如，邇如，乘马班如……（易，屯六二）

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易，大畜九三）

见舆曳，其牛犁，其人夭且劓，无初有终。（易，睽六三）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易，既济初九）

他如“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易，晋卦），也说得很明白。

2. 农业——关于农业上的，卜辞中有农，田，畴，井，疆，甿，圃，囿，畯，亩，艺，禾，黍，嗇，粟，麦，耒，稷，寻，鬻，米，年，季，龢，藉，刍，果，乐等字。此外，不仅和农业相关的酒、鬯、衣等字甚多，殷虚中所发现的酒器，甚而比其他器物为伙。言衣者，据董作宾搜集其第一次发掘关于言衣者又发现二条。